

探访千年学府岳麓书院—— 湖湘人才为何于斯为盛

岳麓山下,森罗滴翠,创办于北宋开宝九年(976年)的岳麓书院安静栖息于此。这里的每一块匾额,每一副楹联,每一块碑刻,每一座教学斋和藏书阁,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承载着湖湘精神。

长江文化考察队第二路来到岳麓书院,因为它是长江文化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书院始于唐、兴于宋,集讲学与藏书功能于一体,是中国古代培养人才、传承文脉的独特教育形式。在书院发展过程中,长江流域一直居于全国第一序列,引领着这种新型教育体制的建设潮流,而历代书院也逐步发展成为长江流域的学术中心。

湖南大学教授朱汉民曾表示,无论是考察书院的源起,审视其发展数量、规模和办学的成绩,长江流域的书院均远远高于其他地域。

在历史上,有据可查的书院约有7000所。然而,千年弦歌不辍并演进为现代大学的,惟有岳麓书院。

为什么是岳麓书院?这座书院为什么培养了这么多优秀的学生?

如今,行走在岳麓书院大气端方的讲堂,讲解员会引导往来游客注意左侧一方小小的石刻。上面的108个字,正是乾隆十三年山长即书院执掌者王文清作出的回答。这位一生著述宏丰,以诗文和考据经史闻名的鸿儒,制定《岳麓书院学规》十八条。

前十条以“立德”为主,要求学生们“时常省问父母”“朔望恭谒圣贤”“举止整齐严肃”;倡导节俭,“服食宜从俭素”;交友谨慎,“损友必须拒绝”;珍惜时间,“不可闲谈废时”。



位于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

本报记者 彭鹏 摄

后八条则以“求学”为主,要求学生们“日讲经书三起”“日看纲目数页”,不仅要读古人的经典,也要“通晓时务物理”,如果读书至深夜,要求“夜读仍戒晏起”。尤其是最后一句“疑误定要力争”,激励着如今不少学子保持批判精神,敢于追问。

时至今日,这份学规仍不过时,并且印在湖南大学学生守则的醒目位置上。2006年8月,新加坡教育次长站在讲堂,细读《岳麓书院学规》良久,对朱汉民说,这个值得引进到新加坡大学。许多大学校长看后,认为这几乎可以原封不动地作为当代大学生学规。

岳麓书院不仅是一座以教书育人为己任的学府,也是可以让思想自由碰撞的场所。走过写有“实事求是”的匾额,书院讲堂正中设有高一米左右的长方形讲坛,这是古代老师授课的地方。屏风前摆放着两把鸡翅木交椅,是为纪念朱熹和张栻两位理学大师同堂会讲。

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张栻主持岳麓书院,朱熹自福建崇安千里迢迢到此交流。两人在学术观点上有所不同,经常在台上激辩,台下四方学子云集。他们不止探究理学,还对国事抒发忧患之心。

岳麓书院党委副书记马华华表示,



毛泽东年轻时曾寓居岳麓书院。

本报记者 彭鹏 摄

“朱张会讲”展现出岳麓书院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开阔胸襟。口口相传的还有这样一个场景:一日清晨,朱张两人登临岳麓山顶,只见一轮红日喷薄而出,朱熹惊呼:“赫曦,赫曦!”为此,张栻专门在两人观看日出的地方修建了一座赫曦台。

此后,作为理学大兴象征的赫曦台,成为学者的神往之地。台内屏风中,著名思想家王阳明就留下了“隔江岳麓悬情久,雷雨潇潇日夜来。安得轻风扫微霏,振衣直上赫曦台”的诗句。

尽管明代后期禁止自由讲学,禁毁书院事件亦时有发生,但岳麓书院的师生仍能在困顿中求索圣贤之道,在艰苦

中承续学术之思,为何?

在讲台两侧的一副66字长联里,我们似乎寻找到了答案。这副长联由清乾隆时期岳麓书院山长旷敏本所撰,是悬挂在岳麓书院的36副对联里最长的一副:

“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涉岳麓峰头,朗月清风,太极悠然可会;

君亲恩何以酬,民物命何以立,圣贤道何以传,登赫曦台上,衡云湘水,斯文定有攸归。”

讲解员告诉我们,当年的赫曦台高踞岳麓山顶。也许正是登得高望得远,

在乐山采访大佛守护人——

千年接力,为乐山大佛遮风挡水

北宋嘉祐四年(1059年)十月的一个清晨,西风猎猎,鼓声阵阵,苏洵、苏轼、苏辙一家的船自嘉州(乐山古称)起航。

这是三苏第二次出川,这一程他们沿岷江而下,入长江、经三峡、抵荆州。

长江文化考察队第一路抵达四川乐山时,是一个与千年前差不多的好天气,只是我们的视角与苏轼有些不一样。

仁立舟头的苏轼,看到奔腾的江水从大佛脚下一掠而过,舟船一下子进入空阔坦荡的平川,于是生出“故乡飘已远,任意浩无边”的感慨。

凌云山顶的我们,与乐山大佛的螺髻齐平。俯视,大佛脚下人如蚁;远眺,三江澄澈相交汇。在这里,青衣江入大渡河,大渡河入岷江,这两条长江支流都藏在乐山人郭沫若的名字中,“沫”指大渡河,“若”指青衣江。

乐山大佛,开凿于唐开元元年(713年)。矗立江畔千余年,大佛一直面临着一道巨大难题——如何抵御日晒雨淋、风化剥蚀。

古人的办法之一是建阁庇覆大佛,相当于给大佛盖了座凉亭遮风挡雨。

历代阁楼屡修屡建,层数不一,但明末兵乱后,乐山大佛已“巍巍独露身”,一直露天而坐,“销却金衣变草衣”,唯靠设置科学的排水系统撑过数百年风雨。

当年,智慧的古人利用佛龛、衣褶等,巧妙设置了一些小型排水沟槽,归流排水外,还在佛身背后的头、肩、胸等部位,设置三层拦截渗水的排水廊道,它们串联起雨水和泉水的流动通道,同时保持大佛线条和造型的完整性,不细看几乎注意不到。

“古人的排水系统在今天看来,依然颇有参考价值。”乐山大佛石窟研究院保护科工作人员王成说,从古至今,对大佛最主要的威胁就是水害。

研究院里,有一整面墙的电子大屏,显示的画面是大佛上半身。“大佛是露天的,上面雨水淋下来,背后山体渗水,脚底临江,地下水会像毛细血管一样向上涌,面临的水害情况复杂多样。”

而大佛所倚的山体是砂岩,砂岩在发生水渗流后,很容易形成溶蚀层。“这就会影响大佛的结构安全。”王成说,所以就国内不可移动文物来讲,大佛的保护难度是数一数二的,很多专家都在研究对策。

2023年,乐山大佛的年度游客人次首次超过峨眉山。

乐山大佛有三种游法,一是从北



游客乘船欣赏乐山大佛。

本报记者 张迪 摄

门沿着游山步道到凌云山,可在山顶近距离一览佛容;二是沿游览步道步行下山,可抵大佛脚下;三是坐游轮,从岷江上瞻仰大佛。

那么九曲栈道呢?很多人印象中,乐山大佛的右手侧有可供游人上下的爬梯,可以与大佛各种角度合影。

“2019年九曲栈道就封闭了。”王成说,栈道上发现了危岩,严重影响文物安全和游客安全。

目前,研究院刚完成栈道一期治理,对88处小型危岩进行了处理,“小毛病解决了,二期会慢慢‘治理’几条大裂隙。”

研究院里的电子大屏一闪,切到大佛的局部放大图。“今年5月,我们在封闭的九曲栈道上架设了一套监控,进行非接触、可视化、高精度的连续监测,并可预警乐山大佛的‘病害’。”王成说。

大佛最怕水害,因为水害会带来一系列病害,比如风化、空鼓、微生物滋生等。但现在,王成和同事们可以在大屏上实时观察大佛身上的各个点位,“一旦数据触及临界设定,就会发出预警,我们可以及时处理。”

同时,研究院还通过微痕提取技术,挖掘肉眼采集不到的信息。

在大佛的右手侧,有一处高高的绝壁。“多年前,我们就发现这里有一块碑,是第三任大佛建造者韦皋立的。可是风化严重,认不全字。现在,原碑上的字都提取出来了。”

依托这套技术,研究院还对大佛旁的一方石龛进行了3D打印,这一米见方的复制件就放在大厅一角,其三佛诸天满满当当,“以前哪怕走在九曲栈道上,这个石龛里的造像也是看不分明的。”

7年来,王成每天上下班都会跟“前辈们”打照面。

研究院外,立有三尊雕像,分别是海通法师、章仇兼琼、韦皋。乐山大佛的凿建历经这三代人,横跨90年,方大功告成。

而1200多年来,更有无数人为大佛耗费心血,只为把不畏艰险、庇护一方的精神传承下去。郭沫若的侄子郭培谦,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对乐山大佛开展本体修缮工作的负责人;马家郁、黄克忠,是对大佛病害进行系统研究治理的第一代国内专家代表人物;黄学谦,是大佛科学保护及文化挖掘传承的第二代领军人物……

我们问王成,他算第几代大佛守护人? “第四代?第五代?”他有点不确



王成向记者讲解大佛预警系统。

本报记者 张迪 摄

定,但肯定的是,他们已从老一辈那里接过了守护大佛的使命。

2020年,有一则乐山大佛百年之后再次“洗脚”的新闻。

听来有趣,当时却凶险万分。那年8月17日至18日,因上游持续强降雨导致青衣江、岷江水位持续上涨。“18日下午,老院长彭学艺就坐立难安了。近半夜时,看雨越下越大,他就冲了出去。”凌晨时分,一个个沙袋,沿着又湿又滑又陡的九曲栈道,以击鼓传花的方式,经每个人的手,叠堆到大佛的脚下,围起一道坝。沙袋的作用不是挡水,是防止顺着汹涌江水而下的坚硬物撞到大佛。后来,每年雨季到来前,沙袋常备。

“科技不是万能的。在没有强大科技为后盾的年代,文物保护靠的是责任心,遵循的是原则性。”王成说。他的理解是,大佛的保护,不是非要用最先进的技术手段,而是要找到最适合的方法。

千年前,能工巧匠们以汗水与智慧凿就这座世界上最大的佛像;千年来,大佛屹立三江,看护众生;千年后,为守护这座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依然有一群人,依然恪守着千年不变的那颗初心。

(本报记者 李蔚 张迪)

走进上海古船实验室考古工作站—— 长江口二号藏着多少秘密

百余年前,带着数量众多的历史遗存,一艘船沉入长江,它同时沉进了一段漫长岁月。直到9年前,一支考古队伍发现了它,整个业界为之兴奋。它的代号是长江口二号。

这艘古船上,究竟承载着多少长江的秘密?带着这个问题,长江文化考察队第三路走进位于上海船厂旧址1号船坞的长江口二号古船实验室考古工作站。

自长江口二号进入人们视线以来,专家们已对它进行了连续多年的水下考古调查。这是一艘清代同治时期的木质帆船。它被认为是目前国内乃至世界上发现的体量最大、保存最完整、预计船载文物数量众多的古代木质沉船之一。

在国家文物局指导下,上海市文物局联合多方力量采用弧形梁非接触文物整体迁移技术将古船整体打捞出水,并迁移至上海船厂旧址1号船坞存放。长江口二号项目由此转入考古和现场文物保护阶段。今年9月,古船考古试掘工作正式启动,这项工作预计将延续至2025年1月。

对于探究这艘古船的奥秘,考古人员早就跃跃欲试。“我们对它充满好奇。”上海博物馆考古部主任黄翔说。

他带我们来到长江口二号试掘现场。此刻的古船,正被保护在一个看似是玻璃罩、实则可开合的保护舱内。几名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沉船表层堆积物清理工作。

“你们看到的这个保护舱可不简单。这里面有很多‘黑科技’。”黄翔向我们介绍,它集成设置了环境及文物本体监测、通风及温度控制、水处理及水温控制、环境及土壤湿度控制等设施,“除了保护,还能对古船进行实时、全面的监测。”

一位现场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些堆积物是古船沉没以后堆积的淤泥。“接下来,考古专家团队将利用沉积学、动植物考古学、分子考古学等手段,回溯长江口二号古船过去的航线、沉没环境、生存条件等,也将解答它‘重见天日’的原因。因此,即使是这些不起眼的堆积物也因藏着大量专家需要的信息而有极大的研究价值。”

长江口二号古船项目未来的路,此刻

我们也能窥得一二。

“我们的发掘从长江口二号的尾部开始。这里布设4个探方,面积约为124平方米。”黄翔告诉我们,由于发掘部位处于船尾,这一轮发掘可以帮助考古人员进一步了解古船结构,以及船舱内堆积的情况,为后续大规模发掘提供必要依据。

分毫必“究”的需求,决定了长江口二号研究工作必须具备极高的专业性和先进性。这也是长江口二号需要拥有专属考古工作站的一个原因。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总面积为3600多平方米的工作站,今年8月刚竣工,它集成可控环境下考古发掘、考古现场文物保护及分析等多项功能,是目前中国最先进、体量最大的智能化考古专用工作站。”黄翔决定带我们仔细瞧瞧。

坐电梯直达地下二层,我们来到一个功能齐全的文物保护实验室。它的作用有多大?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科技中心助理馆员高宇说,一个样本从被挖掘到进行保护处理,最快可在5分钟内实现。“这个送达过程时间越短,便越能降低隐患的发生。”

“例如这枚铁钉,就是我们刚从船上采集到的一个样品。”高宇说,前后不过5分钟,这枚铁钉便来到实验室,通过激光清洗设备进行清洗处理。

“我们实验室还配备微米气相色谱、超声波等清洗机,可在不同情况下处理出水瓷器、铁器、纺织品、木质文物等物件。”

高宇还特别向我们提到,这个实验室用到的考古系统,是我国首个通过自主知识产权定制研发的超大型水下文物实验室考古系统,填补了我国超大型水下文物实验室考古领域的空白。

有专家指出,长江口二号项目的实践对于我国考古、现场文物保护、船体支撑加固、测绘等工作都是一种方法和流程上的验证,能为下一步全面开展考古发掘和现场文物保护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我们期待尽快为大家揭开长江口二号古船的神秘面纱。”黄翔说。

(本报记者 徐添城 李娟 郑琳 杨朝波)



长江口二号古船试掘现场。

本报记者 杨朝波 摄